

革命的文艺必須歌頌人民群众的斗争

——駁邵基麟同志的“现实主义深化”論

刘 綱 紀

我們对现实主义問題的一个根本看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为人民群众的斗争决定着历史的发展，认为革命的文艺必須服从于人民群众的斗争需要，推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这是我们观察文艺問題的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因而也是我们观察现实主义問題的一个根本的出发点。从这个根本的观点出发，我们认为革命的文艺只有正确反映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热情地表现和歌頌人民群众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才能真正充分真实地反映生活和反过去推动生活的前进，从而也才能有我们所主张的现实主义，即和革命浪漫主义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革命现实主义。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马克思主义成为工人运动的革命旗帜的时候，恩格斯就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当时德国的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文学，即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指出它根本歪曲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面貌，因为它歌頌各色各样的沒有革命精神的卑下的“小人物”，“然而并不歌頌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①在论到哈克纳斯的小说《城市姑娘》的时候，恩格斯又指出“工人阶级对于压迫他们的环境的革命的反抗”应该“在现实主义的领域中要求一个地位”，批评了哈克纳斯的小说还“不是充分地现实主义的”，因为它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早已自觉地起来斗争的工人阶级错误地描写成了一些“消极的群众”。恩格斯热切地希望进步的革命的作家能够把工人阶级的“积极方面”正确地描写出来。②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现实主义的一切言论里，贯彻始终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要求文艺必須正确描写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在列宁之后，毛主席在批评主张“暴露”人民的“黑暗”、反对歌頌人民这种资产阶级反动文艺观点时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須歌頌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③在这里毛主席向前发展了和具体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革命文艺必須表现人民群众的革命作用的思想，提出了一个对于一切革命作家说来具有基本的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则。一切革命作家如果在创作上离开了这个原则，就不是什么革命的作家，也绝不可能有我们所主张的革命现实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論艺术》(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95頁。

②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0—22頁。

③ 《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毛澤东著作选讀》(甲种本)下冊，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81頁。

和我们所主张的现实主义不同，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特别是十九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个不可克服的根本的弱点或局限性，就在于看不到人民群众的革命作用，始终不能正确描写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这里我们不去说那些在“现实主义”的幌子下“暴露人民”、污蔑和攻击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作家，即使是那些确实同情人民的资产阶级进步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始终不能正确描写人民群众的。他们常常能够在不同程度上真实描写出人民群众在黑暗的旧时代所遭受的种种痛苦和灾难，但却始终看不到人民群众革命的力量。在他们的笔下，人民群众经常是一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他们一方面深受各种非人的压迫和奴役，另一方面却又显得那样的粗野、愚昧、卑下、无能，不仅无力解放自己，甚至根本不想解放自己。因此，资产阶级现实主义作家对于人民的苦难的描绘虽然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暴露出剥削阶级统治的黑暗与罪恶，但却不能指出造成这种黑暗和罪恶的真实原因，以及消灭这种黑暗和罪恶的现实道路，而常常有意无意地企图掩盖和调和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散布形形色色悲观主义的宿命论的思想。这样的一种现实主义，就其能够帮助人民群众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剥削阶级统治的黑暗和罪恶来说，有不可否认的历史的价值，但它不能给人民群众指出解放的道路，不能鼓舞人民群众斗争的信心和勇气；相反，倒是经常在削弱以致破坏这种信心和勇气。

作为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看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代表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农民》。在这篇小说里，契诃夫对他所描写的俄国农民的痛苦生活无疑怀着深厚的同情，但他从农民身上却看不到任何革命的要求和力量。在他的笔下，所有的农民都显得是那样地粗野和极其愚昧无知，他们经常酗酒，无故殴打妇女，在公众的集会上习以为常地骂最难听的话；他们看到邻居失火，无动于衷地站在一旁看热闹，“什么也不做，瞧着火发呆”，甚至“好像惋惜火熄得太快了”；他们卑躬屈膝地向贵族大学生讨得一个二十戈比的钱就感激不尽；他们受尽了村长和警官的勒索却不知“该怪谁不对”；他们把最后的一切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哭哭啼啼地要上帝给他们“做主”。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里，契诃夫这样谈到了他对于农民的看法：“他们粗野、诡诈、骯髒、醺醉；他们不和睦，老是吵咀，因为他们不是互相尊重，而是互相害怕、怀疑。谁开饭铺，灌醉人民？农民。谁把村社、学校、教堂的公积金浪费了，喝光了？农民。谁偷邻居的东西，放火烧房子，为一瓶伏特卡到法庭上去做见证？谁在地方议会和别的地方团体开会时第一个出头跟农民作对？农民。”尽管契诃夫认为农民之所以这样不是没有“理由”的，但他认为要改变农民这种“可怕”的状况，只能靠社会的“帮助”来把农民从粗野、贫困、愚昧中拯救出来，实际上也是靠统治阶级发慈悲。可是契诃夫也看到这种“帮助”是很渺茫的，他在小说的末尾含着深切的同情突出地描写了玛丽亚这个受尽一切凌辱的农村妇女的形象，以一种象征意味的手法表现了农民的孤苦无助。在通篇小说里，契诃夫始终看不到他笔下苦难的农民群众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他只能在描写农村风景的时候，发出这样一种软弱无力的哀叹：“多么美丽的早晨呵！要是没有贫穷，没有那种使人逃也逃不脱、躲又无处躲的赤贫，大概人世间的的生活也会那样美丽吧！”

历史地看，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作家之所以看不到人民群众身上革命的力量，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受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可能和劳动人民相结合。他们仅仅不过同情人民的遭遇而已，他们在人民群众身上所能看到的只是人民所受的某些苦难以及由于剥削阶级的统治而造成的愚昧无知和粗野。正因为这样，我们虽然对资

产阶级进步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局限性，对他们作品中的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东西，必须如实地严格地加以批判，但是丝毫不对他们怀有超越这种局限性的希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时代从根本上不同于契诃夫所处的时代。我们正处在帝国主义制度进一步加速崩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处在人民群众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自觉地创造历史的时代，处在人民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得到前所未有的充分发挥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革命作家如果不去努力表现人民群众的斗争，歌颂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英雄主义精神，而仍然象资产阶级现实主义作家那样去描写人民群众，那就完全谈不上什么真实反映我们时代的生活，谈不上什么革命现实主义，而只能根本歪曲人民群众革命的精神面貌，把我们的文艺引到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所谓“现实主义深化”的反动本质

邵荃麟同志所主张的所谓“现实主义深化”，实际上仍然是要我们今天的作家步资产阶级现实主义作家的后尘，象他们那样去描写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描写成一些没有革命精神的阴暗灰色的“小人物”。这种极端错误的主张，是和他对于我们时代人民群众的极端错误的看法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在邵荃麟同志看来，人民群众身上背负着极为沉重的传统的旧思想、旧意识的负担，他们要摆脱这些负担而走上革命的道路，一方面是十分痛苦的，另一方面又是十分困难和缓慢的。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正当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日的大风暴中迅速觉醒起来的时候，正当迫切需要革命作家去鼓舞人民群众的斗争信心和勇气的时候，邵荃麟同志却在他所写的《英雄》一书的《题记》里，这样议论正在为民族的解放而奋起战斗的广大人民群众，说什么“一个民族的苏醒并不是象睡觉醒来的那样单纯，传统的封建意识的崩坏和新的社会意识的生长，这过程是异常复杂而迟缓的”；人民“并不完全象我们理想中那么健康和美丽”；“社会生活与国民精神的改造”“是长期性的工作，一个现实主义者是不容许那么天真地去幻想，以为播下种子立刻就可以收获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种种艰苦与悲惨的状态必须现实地去认识”；“整个的人民生活，今天仍然带着灰色的浓重的影子”，等等。所有这些说法，归结起来，它的中心思想不外是强调人民群众身上存在着浓厚的传统的旧思想、旧意识，人民的觉悟和社会的变革是“异常复杂而迟缓的”，又是“艰苦与悲惨的”。这篇《题记》写于1941年，到现在时间已过去了二十几年，我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和抗日战争初期比较起来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他们的革命觉悟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他们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大寨大队、大庆油田工农群众的革命精神，正在鼓舞着亿万人民群众为迅速地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而进行着忘我的劳动。我国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①可是邵荃麟同志却仍然抱着他二十几年前的观点来看我们今天的人民群众，一再强调人民群众身上的“旧的东西”、“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认为背着这些负担的广大的人民群

① 《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518页。

众是一些必然要长期在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动摇着的“中间人物”，认为广大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内心矛盾和痛苦的、并且不知如何漫长的“苦难的历程”，等等。

对于人民群众的样这一种看法，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反人民的看法。它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身上所蕴藏着极大的革命积极性，看不到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它处处看到的只是剥削阶级的统治所加给人民群众的种种消极的东西，是种种传统的旧思想、旧意识，并且把这些消极的东西夸大到了这样一种荒谬的程度，认为革命对于人民群众说来是“痛苦”的、“悲惨”的，认为人民群众要走革命道路不知是一个如何艰难和缓慢的过程。这样，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就被说成了一些视革命为畏途的人物，一些在革命道路上象蜗牛似的痛苦地爬行着的人物。这是根本违反客观事实的反动看法，是资产阶级对于人民群众的污蔑。如果说在广大人民群众还没有充分觉醒的黑暗的旧时代，一个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作家这样去看待人民群众还有某些可以原谅的历史的理由，那末，在我们今天人民群众已经当家作主、自觉地创造着历史的社会主义时代，一向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邵荃麟同志居然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这就是不可原谅的了。不论邵荃麟同志主观上是怎样想的，他把我们时代的人民群众说成是什么动摇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中间人物”，把广大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说成是一个“苦难的历程”等等，实际上是做了那些怀疑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少数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懂得了邵荃麟同志对于人民群众的看法，我们也就从根本上懂得了“现实主义深化”这个主张的用意。邵荃麟同志反复强调我们的作家必须大力“写出矛盾”，“写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充分反映”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他认为不这样我们的作品就会缺少“现实性”，缺少“深度”，“现实主义就不够”。这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作家只有去大力描写人民群众身上的“旧的东西”、“精神负担”和社会主义的矛盾，描写背着这些负担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怎样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痛苦地动摇着、矛盾着，描写人民群众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如何的艰难和痛苦，描写他们在走社会主义道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苦难的历程”，那才能有充分的“现实主义”；相反，如果我们的作家不这样做，而去大力描写人民群众是如何热烈拥护社会主义、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描写他们身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辉的思想品质，描写他们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英雄主义精神，那就是“单纯化”，“对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没有充分反映”，“现实主义就不够”，等等。邵荃麟同志所谓的“现实主义深化”的全部真谛就在这里。而这样的一种现实主义，正是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它所竭力强调的是描写人民群众身上的消极的东西（即各种“旧的东西”、“精神负担”），描写人民群众内心的矛盾、痛苦，描写人民群众的苦难等等，认为只有这样，作家才能达到充分的“现实主义”。显然，如果我们的作家听信了邵荃麟同志的说法，沿着他所说的这种“现实主义”“深化”下去，其结果就会根本歪曲我们时代人民群众革命的精神面貌，把人民群众描写成资产阶级作家笔下的那种没有革命志气、革命理想的阴暗灰色的“小人物”，使人们看不到广大人民群众坚决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崇高意志和英勇精神，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失望，涣散和瓦解人民群众的革命信心和革命斗志，其结果必然是把我们的文艺引到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邵荃麟同志所谓的“现实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其性质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的。我们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反对今天的作家描写人民群众身上的缺点和落后的东西，描写邵荃麟所说的“旧的东西”、“精神负担”以及这些东西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呢？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反对今天的作家写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呢？不是的。问题仅仅在于怎样写，为什么而写。

我们从来不否认人民群众身上也会存在各种缺点和落后的东西，也不否认这些东西是人民群众在革命过程中的一种精神负担；但是，我们认为真正革命的作家必须看到人民群众的身上虽然存在着缺点和落后的东西，但由于他们过去处在一种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因此他们在本性上是要求革命的，他们的身上蕴藏着极大的革命的积极性；至于他们身上的缺点和落后的东西，在革命的过程中是完全能够加以克服的。特别是在彻底摧毁了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更是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革命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分发挥。我们今天的一切革命的作家首先应当看到人民群众身上的革命积极性，满腔热情地去表现和歌颂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作用，以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信心和革命斗志。当然，对于人民群众身上所存在的缺点和落后的东西也是可以描写的。但是，这种描写，如毛主席所指出过的，应该使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①因此，这种描写，决不可以把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涂成一片灰暗，使人们看不到人民群众身上革命的东西，看不到整个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革命作用。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②，要“爱惜”群众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③。这些指示，对于一切革命的作家，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革命的作家如果看不到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不把自己的全部热情首先贯注在表现和歌颂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作用上面，而只注意到人民群众身上的缺点和落后的东西，甚至专门去描写这些东西，那就和资产阶级的作家毫无区别，只会走到“暴露”人民的“黑暗”的反动道路上去。邵荃麟同志把描写人民群众身上的“旧的东西”、“精神负担”和社会主义的矛盾看作是我们的文学的“现实主义深化”的重要途径，这种说法给作家所指引的道路，正是这样的一条危险的反动的道路。事实上，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所出现的某些作品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暴露人民”的反动倾向的端倪。对于这种反动的倾向，我们必须作坚决的斗争。

拿邵荃麟同志所称赏的《赖大嫂》这篇小说来说，它是一篇只能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社会主义的坏作品。在这篇小说里，作者写了一个没有丝毫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处处以“钱就是利”作为生活信条的极端自私自利的人物赖大嫂，通过对她三次养猪经过的描写，津津有味地刻划了这个人物如何为私利而斗争的种种卑下的心理状态，而且还把她写成一个人人“惹不起，怕得起”的人物，周围的干部和群众对她毫无办法。其中作为正面人物出现的那些干部如付业组长立柱妈和她的儿子民兵队长成立柱，一个是“胆子小，情面重，处处怕得罪人”，一个是只知道对赖大嫂采取生硬的威胁手段，总之是谁也没有办法。作者费了不少笔墨写出了赖大嫂这样一个人物，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从小说的描写看来，作者所写的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252页。

②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05页。

③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7页。

赖大嫂身上既然没有丝毫的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因素，周围的一些干部和群众又都是思想觉悟不高，无法对赖大嫂有所影响，这就只能使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私自利是农民的一种本性，这种本性要改变是很困难的。显然，这样的一种作品在群众当中只能起到助长资本主义思想的恶劣作用，丝毫也不能使人们认识资本主义思想的危害，唤起人们和这种思想作斗争的革命热情。而且作者对于农民的这样一种描写，是违反生活真实的。事实上，在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的农村当中，除了少数顽强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之外，在广大的农民里面，即使是那些落后的农民，他们的身上也是有着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的，是能够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进步起来的。然而对于《赖大嫂》这样一篇思想倾向错误的违反生活真实的作品，邵荃麟同志却认为是写出了“矛盾”的符合于他所谓的“现实主义深化”要求的作品，这就具体地说明了他所谓的“现实主义深化”的实质，就是要我们的作家去大力描写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身上的“旧的东西”、“精神负担”，也就是描写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并且把它描写成几乎是无法加以改变的东西；而这样的一种做法，只会把我们的文艺引到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以上我们分析了在革命的作家应该如何看待和描写人民群众身上的缺点和落后的东西这个问题上，我们和邵荃麟同志的根本分歧。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他所反复强调的反映革命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从来认为革命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复杂的，反对文艺上的一切廉价的乐观主义和无冲突论的表现。但是，我们认为尽管革命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复杂的，为了革命的胜利往往需要付出重大的牺牲，可是人民群众在革命过程中所付出的一切代价都不会是白费的，它所换得的是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是千千万万被奴役、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的自由和幸福。正因为这样，广大革命的人民群众向来不怕一切的牺牲，总是排除万难，向前奋斗，前仆后继地去争取彻底的解放。面对着人民群众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一切革命作家无可推卸的崇高职责，就是有力地歌颂这个斗争，写出人民群众在各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主义精神，写出他们建立在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之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鼓舞和推动人民群众的斗争，帮助人民群众信心百倍地去战胜革命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可是邵荃麟同志却不这样看，他要我们的作家去大力描写革命过程中人民群众内心的痛苦和矛盾，描写“社会变革过程中种种艰苦与悲惨的状貌”，描写人民群众走向革命的“苦难的历程”等等；这实际就是要我们今天革命的作家象过去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作家那样，专门去发掘人民群众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把人民群众描写成一些受苦受难的但却无力解放自己并且不想解放自己的人物。对于资产阶级现实主义作家这种专门描写人民群众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的做法，邵荃麟同志一向是十分欣赏的。他在1956年所写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部小说的《校订后记》中，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所谓“描绘人类痛苦的杰出的艺术才能”心神向往，发出了衷心的热烈的赞叹，说他把他笔下所描写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物的“痛苦渗入到自己的灵魂里，和他们共同悲泣、怨愤、受苦，他把他所心爱的人物放在苦难的深渊里，让他们受尽煎熬，受尽迫害，然后从他们的灵魂深处迸发出那样窒息的，愤怒的呼声和惨痛的哀号，用这样的声音激动了他的读者”。这真是一篇淋漓尽致的好评！虽然邵荃麟同志在说了这些话之后也对陀斯妥耶夫斯基多少作了一些批判，但根本不能有力地打中要害，没有指出陀斯妥耶夫斯基以及其他许多资产阶级现实主义作家的一个重大的不可

克服的弱点就是看不到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而且邵荃麟同志在他那些抽象的软弱无力的批判之后，还大讲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有“震撼心灵的强烈力量”等等。可是，我们知道，如果说资产阶级现实主义作家对于所谓“人类痛苦”的描绘在历史上曾经多少起过一些消极地暴露旧社会的黑暗的作用，那末，在我们今天人民群众已经充分觉醒的时代，在人民群众作了主人、完全掌握了自己命运的社会主义时代，革命的作家如果还象陀斯妥耶夫斯基一类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作家那样，把人民群众放到“苦难的深渊里”去描绘，把人民群众走向革命的过程描绘成一个“痛苦”的过程，“苦难的历程”，其结果会怎样呢？其结果只能根本歪曲人民群众革命的精神面貌，把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描写成一片阴森可怕、残酷无情的景象，吓唬人民群众，动摇和瓦解他们的革命信心和革命斗志。这当然是我们所决不能容许的。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无论从那个方面看，邵荃麟同志所谓的“现实主义”都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的根本的错误和反动性就在于它根本看不到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作用，不去大力描写人民群众身上革命的东西，而是要大力描写人民群众身上消极的东西；不去积极地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而是要动摇和瓦解这种精神；不去引导作家热情地歌颂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是要引导作家去“暴露人民”。对于邵荃麟同志多年来所真正信奉着的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现在是到了彻底揭穿和批判它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的时候了。